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第十卷】 主編·呂晴飛

此系韓愈跋古畫卷末詩以爲伊人

陽春道元賸得之特以相示爲題

數語已志七月卅上旅人十標



中國婦女出版社



中国历代诗文鉴赏系列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辞典

主编·吕晴飞
【第十卷】苏轼（上）



中国妇女出版社

目 录

第十卷 苏轼散文鉴赏（上）

苏轼简介	(1)
后杞菊赋（并叙）	(4)
前赤壁赋	(11)
后赤壁赋	(18)
黠鼠赋	(23)
秋阳赋	(27)
刑赏忠厚之至论	(33)
留侯论	(42)
贾谊论	(50)
晁错论	(57)
诸葛亮论	(62)
思治论	(68)
正统论	(77)
大臣论	(82)
续欧阳子《朋党论》	(88)
屈到嗜菱论	(93)
平王论	(98)
隐公论	(105)
六国论	(112)

目 录

论商鞅.....	(116)
始皇论.....	(120)
狄山论匈奴和亲.....	(126)
张九龄不肯用张守珪牛仙客.....	(130)
策略（一）	(135)
策略（四）	(141)
策略（五）	(148)
决壅蔽.....	(155)
无沮善.....	(161)
教战守.....	(166)
倡勇敢.....	(172)
拟进士对御试策（并引状问）	(178)
《范文正公文集》叙	(191)
《六一居士集》叙	(197)
《晁君成诗集》引	(204)
《南行前集》叙	(208)

苏轼简介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中，号东坡居士，亦称“大苏”，或“二苏”（苏洵长子景先早卒）。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画家、书法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有《东坡七集》一百一十卷。《宋史》卷三百三十八有传。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即公元1037年1月8日），苏轼诞生。少年时母亲程氏授以书。嘉祐二年（1057）中进士。这次科举考试，欧阳修任主考官，梅尧臣是参评官，他们对于苏轼的试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十分赞赏，列名第二。这期间，苏轼写了《进策》二十五篇，《教战守》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一篇。仁宗时代，正是所谓宋朝“百年无事”的“太平盛世”，但实际上已经危机四伏。苏轼见微知著，居安思危，提出了改革弊政的革新主张，以革新派的面目走上了政治舞台。

苏轼作了几年主簿、判官之类的地方小官之后，于英宗平治二年（1065），调回京城，任殿中丞。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副宰相），实行变法，其中已包括苏轼提出的改革主张，但激进得多，也丰富得多。苏轼本当拥护新法，但是由于他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等原因，使他站在保守派一边，反对新法。于是熙宁四年（1071）被贬为杭州通判，后又转知密州（今山东省诸城）。熙宁九年

(1077)十二月又徙知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时遇黄河决口,苏轼亲率军民护堤守城,保全了人民的生命财产。神宗元丰二年(1079),徙知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就在这一年,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出苏轼诗文中的某些字句,断章取义,说他讥谤新法,加以弹劾,将苏轼逮捕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御史府。《汉史·朱博传》:“御史府中列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其上。”因称御史府为乌台)。苏轼在狱中受尽折磨,出狱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又改调汝州团练副使。在一个时期中,苏轼心有余悸,不敢写诗著文。早在苏轼贬为杭州通判时,其表兄文与可就曾劝诫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见《石林诗话》)。可见当时“文字狱”的厉害。

2 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执政,苏轼被召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此时,苏轼主张对王安石的新法“参用其长”,反对司马光等不加区别、一概废除新法的做法。正因此,他又为旧党所不容,被贬为杭州知州。在杭州任上,他率众开湖筑堤,颇有政绩,西湖中“苏堤”至今犹存。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起,对“元祐党人”进行报复、迫害,苏轼又横遭贬谪,以六十高龄,被贬到荒远的琼州(今海南省)作别驾。宋徽宗即位,大赦,苏轼在赦归途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时年六十六岁。死后谥号“文忠公”。

苏轼一生的仕途是不平坦的,多次卷入新旧党争的政治漩涡中,屡遭贬谪,动辄得咎,成为北宋朝廷党争的牺牲者。

苏轼在思想上深受儒、释、道三家的影响,他所标榜的

“蜀学”，实际上是上述三家思想的杂合，所以说苏轼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但就基本思想来说，他还是属于儒家。

“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苏轼《次韵仲殊雪中游西湖》）。苏轼在政治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文学上却得到极大成功。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全能”作家，几乎在所有的文学艺术领域里，都取得了高度的成就。苏轼继欧阳修之后，是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和文坛领袖，这场诗文革新运动实际上到苏轼手里才算最后完成，苏轼的散文作品代表了北宋的最高成就。人言“韩潮苏海”，与古文大家韩愈相提并论；世称“欧苏”，与“宋代的韩愈”欧阳修并驾齐驱。释德洪《跋东坡枕池录》：“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行浩荡，则其波亦自然而成文。”其文章风格“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苏轼共写了二千七百多首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实际上，其成就远远超过黄庭坚而达到他那个时代的最高峰。苏轼词开豪放一派，“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稼轩词序》）。与辛弃疾齐名，世称“苏辛”。苏轼的书法，取法颜真卿而又独创一格，与蔡襄、黄庭坚、米芾并称宋代“四大书法家”，有《前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答谢民师论文帖》等墨迹存世。苏轼的画亦有名，曾颇有见地地赞誉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自己则爱画竹木怪石，取法文同（即文与可）而胜文同，在宋代画苑中，向来以“文苏”并称，苏画世存有《枯木怪石图》、《竹石图》等多幅。

【后杞菊赋】（并叙）

苏 轼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

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粮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

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
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
阳之寿。”

据本赋“小叙”而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推算，此赋作于熙宁八年（1075），苏轼四十岁，知密州（亦称“胶西”，在今山东省诸城）。这年密州蝗虫成灾，疾疫流行，农田不收，民不聊生。“东南至于江海，西北被于河汉，饥馑疾疫，靡有遗矣”（苏轼《密州祭常山文》）。“何人劝我此间（密州）来？絃管生尘甑有埃。绿蚁（酒）沾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苏轼《次韵刘贡父李公泽见寄二首》之二）。

那么，在这灾荒年月，密州知州苏轼的情况如何呢？他“朝衙达午，夕坐过酉”。酉，酉时，相当于下午六、七点钟。苏轼在州衙办公，从早上到中午，一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回家，不辞辛苦，忙于州政，处理救灾事宜。在个人生活上，“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这里“草木”指杞菊、野菜、树叶等可以代粮充饥的东西，太守也以草木充饥，杞菊不过是草木中名称较为高雅者而已。太守苏轼与通判刘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目的是充饥，是自己诳骗自己的肚皮，完全没有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那种悠闲自得的心情。州府的斋厨索然，不设杯酒，即使弄到一些“麦饭葱叶”等粗茶淡饭，苏轼一想到灾民的饥饿痛苦，就“对案颦蹙，举箸噎呕”，难以下咽。这都说明苏轼居官廉洁，艰苦朴素，节衣缩食，勤政爱民。他与那班花天酒地、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真是有着天壤之别。

这一方面表现了苏轼高尚伟大的人格，正如王国维在《文学小言（六）》中所说“三代以下的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另一方面，也说明知州、通判尚且以草木充饥，那么平民百姓的饥饿痛苦就更不用说了。本赋中心思想，不仅是抒知州、通判一二官员食草木充饥的清贫，而且是发万民饥寒交迫的痛苦，“以讽朝廷政事缺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矛头直接指向实施过激而又不合民情的“新法”。这便是作者写作此赋的用意。苏轼并不绝对地通盘否定新法，但对新法过激以及推行不力所造成的弊病是不赞成的，特别是在民不聊生的灾区，更不宜急于推行。灾害可以设法救助，而“新法”则是不可抗拒的。在苏轼看来，“新法”在密州这样的灾区，是不便实行的。

从写作手法看，本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一、从体式上创新，不落旧赋窠臼。本赋使用“自问自答”的方式，一开头就气势不凡，引人入胜。洪迈《容斋随笔·五笔》“东坡不随人后”条：“东坡公作《后杞菊赋》，破题直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岂区区巢林翺羽者所能窥探其涯涘哉！”这说明苏轼不沿袭旧赋“习根”，敢于创新，独步新径，不随人后。所以他能创造出最新最美的作品。

二、曲笔隐忍，宛转嘲讽。苏轼的思想是复杂的，矛盾的，一方面他感到仕途坎坷，愿归田园，眉山苏氏是个大户，确实不缺他那一口麦饭；另一方面他感到壮志未

酬，愿为君为民做番事业，即使官场风波再险恶，打击再严重，生活再贫苦，也不悔恨，他在《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中写道：“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这首诗可以作为本赋第一段的注脚。诗是写给友人王庆源的，同时也是自比自况，他不把自己看作高于百姓的官老爷，而看作“识字的耕田夫”，生活上节衣缩食、忍饥挨饿也在所不计。故乡岂无一口饭吃！友人王庆源可以“拂衣谢事”，归田了事，苏轼却不能，这是他复杂矛盾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所决定的。苏轼答话中说：人生一世十分短暂，什么“贫、富、美、陋”，没什么差别，都将“同归一朽”，苏轼是在委婉地借庄子的“齐物”论以自嘲，接着为自己食草木充饥而巧找理由，说什么“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墨瘦”，自己以杞菊为粮也许还会长命百岁呢！这真是含泪的微笑。苏轼的处境常使怒骂寓于嬉笑，嬉笑同于痛哭，他曾托蝉的长吟抒发自己“皆缘不平鸣，痛哭等嬉笑”（《定惠师竹下开小轩》）的隐忍之情，这与长歌当哭何异！苏轼写此赋时已不能畅怀用笔，只好采取“曲笔”，隐忍宛转而嘲讽，实际上是借自嘲以嘲“新法”的“不便”，借自讽以讽“朝廷政事”的“缺失”，之后又在无可奈何之中嬉笑而痛哭，强作自我宽解。

第三、典故运用恰到好处。一般来说，赋离不开典，甚至用典过多而成病态。本赋用典恰到好处，并无典故堆砌的毛病。一共用了七个典故，第一段用了一个：“昔阴

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典出《后汉书·列传七十二》，井丹，字大春，扶风郡郿县人。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沛王刘辅等五王宴请井丹，丹不去，信阳侯把他骗了去，五王给井丹吃粗茶淡饭（即所谓“麦饭葱叶”），丹推去不吃，更换丰盛的酒肉，井丹大吃起来。本赋反其意而用之，昔日井丹推去“麦饭葱叶”而不食，而今太守连这些粗茶淡饭都吃不上，只有草木充饥而已！即使弄到点粗茶淡饭也是对案不食。这与井丹截然不同，井丹是嫌饭菜粗劣而推去不食，苏轼却是想到灾民的痛苦而不忍下咽，两人的思想境界是多么不同啊！第二段用了六个典故：“糠核瓠肥”，典出《史记·陈丞相世家》，丞相陈平年轻时长得又高又胖，有人问他：“你家很贫穷，你是吃什么食物而长胖的呢？”他嫂嫂说：“吃粗糠罢了！”“梁肉墨瘦”，典出《太平御览》卷三十八，说陈思王曹植很瘦，虽说吃得饭食精美，但长不胖。苏轼用这两个典故说明饭菜不在于好坏，为自己吃糠咽菜而解脱。“何侯方丈”，典出《晋书·何曾传》。何曾“性奢豪，务在奢华”，面前一丈见方的桌案上都摆满了美味菜肴，“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庾郎三九”典出《南史·庾杲之传》，庾杲之，字景行，官任尚书驾部郎，但生活清贫，每日只吃韭菹、淪韭、生韭三种青菜，任昉曾开玩笑说：“谁说庾郎贫穷，他每餐就吃二十七个菜。”原来，“韭”与“九”谐音，三韭（九）等于二十七。前典说何曾真富，食品精美丰盛，后典说庾杲之假富真贫，所吃二十七个菜不过是“三韭”。苏轼在这里用这两个典故说明不论丰约贫富，都不免一死，“同归于一朽”。“西河”，

指孔子的弟子子夏，也叫卜商，活了一百岁。“南阳之寿”，典出《艺文类聚》卷八十一。南阳酃县有菊水，太尉胡广饮此水治好了多种疾病，近百岁才寿终。“西河、南阳之寿”说长寿，用来说明以杞菊充饥，兴许还会长命百岁呢！本赋用典恰当、妥贴，第一段用一典不嫌其少，第二段用了六典不觉其多，使人感到恰到好处。

本赋正文前还有“叙”文，叙，同“序”。苏洵的父亲叫苏序，因避家讳，在苏洵的文中以“引”代“序”；到了苏轼、苏辙辈，“家讳”已不那么严格，在他兄弟的诗文中，都以“叙”代“序”。这篇“叙文”几乎与正文一样长，并非可有可无，其作用是：本赋题为《后杞菊赋》，而苏轼并未作过《前杞菊赋》，那么“前赋”指的是什么？“叙文”告诉我们是陆龟蒙的《杞菊赋》。“叙文”表明苏轼是因陆赋而“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交待写作的起因。“叙文”中说，对于陆赋，“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苏轼以往高官厚禄，是无法了解贫士饿食草木的苦状的，认为陆赋写得太过份，即言过其实了。只有苏轼亲自食杞菊以充饥的时候，才能相信陆赋不谬。这段话是有讽喻意义的。苏轼的“后赋”如果当朝执政者看见，由于他们高高在上，养尊处优，花天酒地，正在洋洋得意地认为所谓“新法”能够富国强兵呢，那里知道密州知州和千万灾民草木裹腹，奄奄一息呢！他们对苏轼的看法定会象当年苏轼对陆赋的看法那样，认为写得太过份，太言过于实了！苏轼写这“叙文”的目的在于用自己对陆赋看法的变化，讽喻当朝

执政者要正确地对待自己这篇赋，免得加害于自己。用意是良深的。苏轼在“叙文”中将自己的“后赋”与陆赋作了大略比较。现将陆赋即陆龟蒙《杞菊赋并序》录于后：

天随子宅荒，少墙屋，多隙地。著图书所前后，皆树以杞菊。春苗恣肥，日得以采撷之，以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旦暮犹责儿童拾掇不已。人或叹曰：“千乘之邑，非无好事者家。日欲击鲜为具以饱君者多矣。君独闭关不出。率空肠贮古圣贤道德言语，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几年来忍饥诵经，岂不知屠沽人有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赋》以自广云。

惟杞惟菊，包寒互绿。或颖或苕，烟披雨沐。我衣敝终，我饭脱粟。羞渐齿牙，苟且梁肉。蔓延骈列，其生实多，尔杞未棘，尔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陆赋与苏轼“后赋”都有小“序”，都写以杞菊充饥，不同的是：陆赋不过反映了一个未官高士的怀才不遇，以及清贫高放和无视富贵、乐于清贫的气节；而苏轼“后赋”，则是表现一个州官以杞菊充饥，与民共度灾荒，写作动机与主题，如上所述，远比陆赋深厚、广阔、复杂得多，在表现手法上也高出陆赋一筹，可以说是后来居上之作了。

（牛宝彤）

【前赤壁赋】

苏 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

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

舳千里，旌旗蔽空，酹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近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前赤壁赋》是宋朝大作家苏轼的一篇著名的作品。他曾经两次游赤壁，写了两篇赋。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他的《前赤壁赋》。周瑜大破曹操的赤壁，在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苏轼所游的赤壁在现在的湖北省黄冈县。他游的是假赤壁，写出来的却是好文章。

《前赤壁赋》是一篇散文赋，实际上也就是一篇优美动人的散文诗。苏轼是一个才情横溢、诗文俱佳的古代大

作家。谈到散文，人们常说“韩潮苏海”，意思是说韩愈的文章象潮水一样地奔放，而苏轼的文章则象海水一样地广阔。在词的成就上，苏轼是和南宋著名作家辛弃疾并驾齐驱的。苏轼的作品纵横豪迈，风格鲜明而突出。即使是你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单看这篇赋也可以大致了解他作品的特点和风格。

文章刚一开头，作者就用秀丽的字句，简明而富于特征的笔法，写出了时间和自然风光，使人置身在画图之中。

“七月既望”是农历七月十六的意思。农历的每月十五日叫做望，既望就是每月十六日。“苏子”是作者的自称。“明月之诗”指的是《诗经·陈风》里的《月出》那一首诗；“窈窕之章”就是《月出》诗里的《窈窕》那一章。“徘徊于斗牛之间”的“斗牛”；指的是南斗星和牛宿星。

这一段原文的意思是说：壬戌年的秋天，也就是宋神宗元丰五年的秋天，七月十六的时候，苏轼和客人们驾着小船到赤壁下面的江上游玩。清爽的风儿慢慢地吹来，江面上的水波很平静。对着这清风明月，主人举起酒杯，请客人共同饮酒。大家朗诵起《月出》这首诗的《窈窕》这一章来。一会儿，月亮从东山上出来，在南斗星和牛宿星之间徘徊，缓缓上升。白茫茫的雾气横在江面上，水光和天相连接。任凭小船儿随意飘荡，凌驾在这茫茫无边的江水上。浩浩荡荡，一时就好象到了天空，乘驾着风，不知道要浮游到什么地方；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好似脱离开世界而超然独立，象道家飞升而登上了仙界一般。